

序一

林護在主懷安息已經超過 80 年，但他的家人沒有忘記他的愛心，香港的教會沒有忘記他的貢獻，社會也因着以他的名字成立的基金而沒有忘記他的關懷。他的一生，在我們教會的歷史上，永垂千古。

年方十四，林護便加入了當時的出國潮，隻身遠赴澳洲。天生積極、進取的性格，外地的生活使他大開眼界，得益匪淺。他先後在墨爾本和悉尼的雜貨店任職。在墨爾本時，他日間在店內勤勞工作，晚上到青年會用功學習英語，並在華人聖公會教堂受洗。他後來返國結婚。

之後，他移居香港，成立了一間建築公司。這時，香港的轉口貿易正在迅速發展，新思維和新觀點也趁機經香港源源不絕地傳入國內。他後來與兄長一起建立的聯益建造公司採用了創新的建築方法，也僱用了大批鄉親。他的公司很快就獲建築界公認為策劃精心細緻、工藝優良可靠的典範了。它參與了本港多項政府和民間的重大工程，

也為香港的基建樹立了根基。11層高的東亞銀行大廈，它可算是香港當年的摩天大廈了，就是由聯益公司建造的。林護的公司也參與了上海和廣州的建築工程。

林護是一個關心社會、熱愛祖國的人，對孫中山和他領導的革命也是毫不猶豫地支持的。像孫中山一樣，他深信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的原則，這在他對中國現代化和基督教精神的熱衷反映出來。

林護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基督徒。他是香港華人青年會和聖公會聖保羅堂的創辦人之一。他有一個博大寬容的信仰，因此很自然地成為了社交能手，活躍於教徒與非教徒之間。他在社會各階層都很有名望和受到尊敬。聖保羅堂是由他的公司、在他親自督導下建造的。他也參與了聖馬利亞堂的建堂計劃，但不幸於1933年辭世，未能目睹它的落成。林護的公司建造了聖公會不少中學以及青年會的大廈。他的公司也建造了廣州的第一座聖公會教堂「救主堂」。它跟香港的聖保羅堂和聖馬利亞堂一樣，至今仍然服務着各自的教區。林護向教會作了不少捐獻，也花了不少時間和精神，為教會以至整個社會提供專門技能的服務。

我視林護和他不少同輩為香港華人聖公會的奠基人。倫義華、杜培義和何明華三位主教，以及我們的華人牧師，都很欣賞他的為人。香港聖公會，有史以來，一直都很倚重非神職人員如林護等人。活躍的非神職人員是教會健康成長的要素，林護的例子給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很高興見到，直至今日，林護的家人，很多都是聖保羅堂的忠誠支持者，他們也繼續參與各項社會服務工作。

這本講述林護生平事跡的書籍，對關注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期香港社會和香港聖公會發展過程的讀者來說，是很值得一讀的。林護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很多，如說話輕聲細氣、有內在的威嚴、對家庭負責任和堅信耶穌基督等。

香港聖公會大主教鄭保羅

2016年6月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序二

林護是我的祖父，但我從未見過他。他去世後我才出生。但他的故事，我耳熟能詳，因而對他的為人，萬分景仰。聽來難以令人置信，一個只受過有限教育的十四歲青年，會離開貧瘠的家鄉，遠赴澳洲當勞工。他不但勤奮工作，而且努力學習，參加青年會學英語、進入聖公會教堂聽道，並且受洗而成為基督徒。這一切，都有助於他日後在香港的巨大成就。

1949年後，林氏家族很多人移民外地，尤其是美加。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時，見到很多親人，他們都非常渴望多知一點林氏家族的來龍去脈。在外五十多年後，我回到香港，發現生活在這裏的林家年輕一代也同樣對他們的祖先一無所知。這使我想到了，應該請人寫一本有關祖父林護的書。

我很早就認識陳慕華教授了。我們是在倫敦參加一個醫學專科考試時初次見面的，距今已超過了半個世紀。她跟我有點姻親關係：她

丈夫楊保謙的母親是我的姨媽。倫敦別後，我去了多倫多，她前往溫哥華，很少見面。她後來成為了世界知名的胸肺科專家。萬料不到她退休後，會搖身一變，成為多產作家。

幾年前，我的堂姊李林建華問我：「你有看過 *To Serve and To Lead: A History of 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Hong Kong* (《役己道人：香港拔萃男書院校史》) 這本書嗎？」我說沒有。她於是着我找來看看，因為內裏有些地方提到爺爺。我終於找到了這本書，原來是慕華跟馮以滋先生一起寫的。一次，我們再見面時，便趁機問她：「慕華，你寫了我祖父林護，為什麼不告訴我？」她的答覆是：「我不知道他是你祖父。」

八年前，我們遷回香港。2010年初，知道慕華正準備寫一本有關何明華會督的書。會督是先父(林植豪)的好朋友。慕華和我曾經多次談及這本書。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她將會是撰寫有關祖父林護生平事跡的理想人選，於是約了她和保謙出來談論此事。數天後，她給了我一個正面的答覆，這使我喜出望外。我本意只是寫一些關於祖父的小故事，讓後人知道一點先祖的事跡。我從未想過慕華會那麼認真、花那麼多時間去做研究，並發掘出那麼多我前所未聞的資料。

這本書描述一個有膽有識的人、一個非常成功的建築商、一個使人驚訝的基督教慈善家，以及一個致力建設新中國的「革命完人」(孫中山語)。這是一本很值得閱讀的歷史書。我非常感激陳慕華教授寫出這樣的精妙珍品，也很感謝馮以滋先生把它翻成中文。

林柏年
2016年4月

自序

本書的主角是林護，二十世紀初香港一個非常成功的建造商。他是當年不少邊緣人物的代表，這批生活在戰亂和貧困環境之下的華人，捲進了出國潮，遠赴重洋，到海外謀生。他們後來因為排華或其他原因而返國，但不少最終在香港這個相對穩定和充滿商機的地方定居下來。

出外謀生的人，不管是華人還是來自其他國家的公民，要在新地方取得成就，就要有某些長處。林護的優點可真不少：他會細心觀察、勤懇工作、入鄉隨俗、學習當地語言、建立社交網絡、投入當地社會，並且根據觀察所得，運用學到的知識，抓緊機會，進行膽大心細的冒險。像某些海外華人一樣，他有高度的辨析力，能分辨出哪些是最寶貴的家庭和鄉土傳統、哪些是他在澳洲接觸到的優秀西方文明和價值觀，並把它們糅合起來。他又善於判斷：何時應該進取、何時應該整頓、何時應該堅持、何時應該放棄。

這本書讓讀者窺見中華民國成立前後20年，香港的社會和政治形勢。通過閱讀林護和他家人的事跡，我們可以對當年香港一小撮獨特的華人有一鱗半爪的認識。他們主要是基督徒、受過教育、比較西化、支持革命、致力推翻滿清政府，以及協助在香港成立具影響力的基督教青年會。際此世界各地正面臨人口過剩，而資源和土地都相對缺乏的情況下，香港從一個微不足道的漁港發展成一個國際都會的經驗，利用填海造地以解決因內地居民湧入而造成的人口膨脹問題，或可供一些面臨困境的地區視作他山之石。在認識香港建造業發展的同時，我們也知道，政府成立了「建築事務監督」和通過了法例，以制定標準和保障安全。

我是在什麼情況下對林護產生興趣的？

我初次遇到林護這個名字，是為拔萃男書院校史一書搜集資料的時候。林護1924年初獲得拔萃旺角新校舍的建築合約，但次年便出現了省港大罷工的風波。大罷工導致香港經濟蕭條，舊校舍的買家破產，拔萃無法支付建築費。在這艱難的日子裏，林護仍然盡其所能，如期完成工程而不追收建築費。建造商需要相當多的流動資金來維持業務，因此很少是會這樣寬宏大量的。記得我當日看到這項資料時，內心激動不已。

第二次接觸到他的名字，是我為寫何明華會督(Bishop R. O. Hall；維多利亞及華南教區的主教)的傳記，搜集資料的時候。資料顯示他主持了林護的葬禮，並在1934年第一期的*St. John's Review*寫道：「在華人教會的發展過程中，他的離去，好像是一個時代的終結。在那千變萬化的四、五十年間，這個德高望重的老人家，以他一貫誠實可靠的

聲譽，賺得了錢財……。 (從澳洲) 回來之後，為興建教堂，他奉獻了手上小量資產的三分之一。他和一兩個同輩，用了全部公餘時間，以大無畏的精神，進行傳道和教育的工作，藉以宣揚福音……。後來，林先生當上了中華聖公會最高層理事會的成員和『教區會議』的司庫，並致力慈善工作。……」好一個非常務實的華人企業家，同時又是一個慈善為懷的基督徒，這引起了極大的興趣。

後來才發現，這位「非凡人物」跟我有姻親關係：他的孫子林柏年醫生跟我丈夫楊保謙是姨表兄弟。林醫生委以重任，要我寫一本他祖父的傳記，讓我感到很榮幸。我是在香港長大的，曾經見過一些林護當年建造的莊嚴、宏偉建築物。由於地價不斷攀升，位於中區的大多已讓位給更高的大廈，但在其他地區，不少已列為「歷史建築物」，如：聖保羅堂、聖保羅男女中學、拔萃男書院、聖士提反書院和馮平山圖書館等，它們至今仍然完好可用。

林護的貢獻不止於上述，還包括香港的基礎建設。他重建了一些港口設施，如香港黃埔船塢，有助於香港從一個小小的漁港轉變為一個炫目的國際大商埠。在道路建設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環繞新界的公路和其間的橋樑。它們不但方便了政府對這個地區的管治，也因為連貫了香港市區和新界以及內地，改善了食物和日用品的供應。日後香港更從廣東輸入東江水。通過積極參與東區的填海工程，林護也為灣仔地區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他是一位虔誠的聖公會信徒，經常投入教會和華人聖公會社區的事務，為它的擴展作出了不少貢獻。他是聖保羅堂的創辦人之一，也是成立香港青年會的鼓吹者，因為他相信，這個會有助於青年人個性

的成長，使他們在德、智、體三方面都有均衡的發展。林護對社會公義和性別平等的進步思想，導致他領導「反妹仔」運動。在中國舊社會，窮苦家庭有時會把女兒賣給有錢人家當傭人，俗稱「妹仔」，這做法民國成立後才廢止，但香港當年仍盛行。他支持女子教育，創辦了聖保羅女書院，即現在著名的聖保羅男女中學的前身。他又在家鄉建立了一所小學，並且捐贈了不少給嶺南大學。他對教育事業的贊助，也許是他眾多的慈善捐輸之中，會留給世人最長遠記憶的一項。

比較少人知道的是，他年輕時對革命事業的參與。他是孫中山的擁護者：先後在1903年和1905年加入了興中會和同盟會。他為革命事業捐獻了不少，也籌募了不少。他明知犯險，也義無反顧地在1911年4月的廣州起義失敗後，協助把72烈士的屍骨埋葬於黃花崗。革命成功後，他支撐着瀕臨破產的廣東軍政府，也繼續支持孫中山致力達成目標：保護共和國的憲法，以及統一因軍閥割據而弄至四分五裂的國家。

如果你知道他的出身是如何的低微，他的故事就會更加使你感到驚訝。林護是廣東新會一個農民家庭的小孩，只受過幾年私塾教育，十四歲就隻身上路，遠赴澳洲謀生了。他在墨爾本一家雜貨舖當店員，因工作勤懇、為人誠實而受到僱主賞識。他日間致力工作，晚上到青年會學習英語，加強本領，為前途奠定基礎。他在墨爾本受洗，成為聖公會的教友。他在墨爾本五年、悉尼兩年，之後回國，口袋裏多了一千大元，加上一口流利的英語和在悉尼建立的華人基督徒網絡。這網絡對他日後的事業發展，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有關林氏家族的第一手資料來自：(一) 兩本家族文集：《林氏集思冊》(1998) 和《飛龍集思錄》(2008)；(二) 小量廣州永益公司留下的紀錄；(三) 訪問林氏家族的後人，包括林柏年(林護的孫子) 和李林建華(林護兄長裘謀的孫女)；(四) 跟林柏年、李林建華、林建國(林建華的弟弟) 和林仲瑜(林護堂弟裘銳的孫子) 的私人通訊(電郵)；(五) 香港 1890 至 1940 的報章，包括《德臣西報》、《中國之友》、《南華早報》、《士蔑報》和《華字日報》。至於有關香港政府在這段時間的資料，則主要來自網上《香港政府報告》裏的《憲報》、《行政報告》、《立法會會議文件彙編》和《藍皮書》。土地註冊處的資料取自香港政府檔案處。有關香港十九世紀下半頁和二十世紀早年的歷史，以及辛亥革命和民國初年的事跡，我參看了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收藏的一些有關書籍，這些都列於本書英文版的附錄。

本書分十章。第一、二章講述林護的家世、前往澳洲的經過，以及在澳洲的經歷如何影響他的一生。第三、四章說的是他回鄉結婚之後的故事，如何決定留在香港尋求新發展，以至成立自己的建造公司和發展各種社會網絡。第五、六章列舉他的革命活動，以及他如何通過修築道路、建築倉庫和蓋造房屋，協助國家進行現代化。第七、八章敘述他在香港的工作：為這個城市建築道路、發展港口、填海造地和興建高樓大廈。有些建築物至今猶存，成了地標。第九和第十兩章分析了他公司成功的要素和描述了他留給社會的遺澤。

為了要清楚了解林護多方面的情況，我致力認識他所處的年代、香港和國內的政治和社會形勢。執筆時，我務求在有關林護生平的事

件上，做到絕對正確無誤的地步。由於時代久遠，時間的差距使我不得不運用想像力，去填補一些紀錄上的漏洞。由於林護沒有留下個人書信、日記或其他文字紀錄，而未能確切知道他的內心感受，我只有竭盡所能，根據他所處的動蕩時代，描繪出當日社會的各式景致和他的個人經歷。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下，他不但養育了一群兒女，並建立了一間公司和一個能夠延續其遺志的家庭。

因為林護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建造商：他超越了他們，他的故事將會引起很多香港華人和海外華僑內心的共鳴。林護是一位革命者、一員社會改良分子、一名慈善家，更是一個愛國、愛民的人。他是一個虔誠、熱心服務教會和社會的基督徒，但也服膺儒家以家庭為重的觀點。他高度關心家庭和家族成員的福祉，以至並不認識的晚輩也因而受惠不淺。通過以其遺產成立的「林護紀念基金」，他的後人延續了他的善行。

陳慕華

2016年6月